

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 中美贸易战的多重博弈与中国的出路^{*}

谢 地 张 巩

内容提要 传统贸易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均认为贸易可以产生双赢的结果，通过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都会得到提高。当然，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市场等严格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原始模型的假设进行修正，即考虑到产业具有保留性，后来者通过学习技能能够实现追赶的情形，就会发现贸易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对一国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在某些条件下是一种零和竞争的结果。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冲突使各国频繁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应对贸易引发的竞争。当前，从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内在动机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有更多的产业与美国在贸易领域展开竞争。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取代，遏制中国的崛起与赶超，同时为美国能够在中国发展中谋取更大的利益，是美国的现实诉求。如果美国无法达到这一既定战略目标，中美贸易战就有可能一直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据此，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应保持强大且理性的战略定力，制定符合多重博弈特征的博弈应对策略。

关键词 国际贸易；国家利益冲突；多重博弈

作者 谢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巩，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长春市委党校讲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标准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 18ZD036）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贸易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封闭经济中，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商品价格在两国之间不等，只要一国在某一商品的生产上所消耗的成本绝对低于他国，该国就具备生产这种产品的绝对优势，从而可以出口，反之则进口。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价格的差异是劳动生产率不同所导致的，即使一国处于绝对劣势，只要其某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种产品，即存在比较优势，那么该国就可以通过把专业化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从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更进一步地，如果两国劳动生产率相同，在封闭经济中还会存在不等的价格比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 H—O 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丰富的生产要素，即便两国生产率水平完全相同，只要要素禀赋不同，该国仍然可以出口由其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由其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以提高福利水平。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建立在小国假定、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等严格假定的基础之上，均认为贸易可以产生双赢的结果，通过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都会得到提高。当然，在一个不存在技术变革或技术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一国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是预先注定的，因为一国只有作为特定产品的最优供应商才能成为产品的主要生产商，唯一的自然结果使世界经济实现了唯一均衡。然而，进入工业社会后，很多产业都要求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高进入壁垒、干中学等后天优势而非自然优势在产业竞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各国都可以通过学习实现技术赶超从而获得一个产业的领先地位，这使得原来由自然优势确定的唯一结果不复存在，世界贸易出现了多重均衡。这种多重均衡导致自由贸易可能使贸易中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即对一国来说的最优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不利，国际贸易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① 那么，哪些结果对一个有既定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呢？一般来

^① Ralph E. Gomory and William J.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0.

说，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二战后美国会制定“马歇尔计划”帮助其贸易伙伴走向复苏，而如今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虽然，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还没有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双方在贸易均衡模型中并没有步入冲突区，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开放日益扩大，中国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加之先进制造业的逐步完善和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将逐渐由低端转向中高端，这必然会与在全球贸易布局中掌控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领域的美国发生竞争和碰撞，贸易领域中的互利共赢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所取代。为遏制中国崛起、维护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就不足为怪了。就贸易战的本质来看，这是一场事关国家利益的国运之争，只要中国不停止崛起的步伐，中美贸易战就有可能一直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斗而不破、边谈边斗”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主旋律。据此，中国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从国情出发，保持强大且理性的战略定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加强对美国相关问题的研究，制定符合多重博弈特征的博弈应对策略。

二、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保留产业与多重均衡

贸易自由化发展到今天，贸易产业的成败已经成为一国福利水平与国家利益得失的关键。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应用的古典贸易模型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减的基本假设基础之上，是指当一个产业扩大规模时，其产出效率是不断下降的，增加的产量将耗费更多的生产成本。这一假设符合 200 多年前的世界发展情况，对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来说，最好的或最容易获得的土地往往是最先被耕种的，随着产量不断增加，较为贫瘠的土地便会得以开发，生产率降低的同时生产成本也会上升。在收益递减的世界中，通常只有一种唯一的均衡结果，且这种唯一的均衡在某种意义上总是最好的。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在某一特定产业中生产的生产者就是该产业的唯一生产者，效率较低的生产者会被驱逐出该产业去从事它们比较有竞争力的生产，也就是说每个产业只由最具生产效率的国家来生产。在技术和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唯一的均衡使消费者的偏好得到最佳满足，自由市场力量总是推动经济趋近这样的生产组合（即效率较高的生产者取代效率较低的生产者）。简单说，这就是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在一个规模收益递减的世界里的运作，总是将经济推向一个最有效率的均衡结果。但是，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许多领域的小规模进入已不再可能，比如汽车、电脑、手机等行业，人们不可能在车库里白手起家生产一辆汽车去和通用公司竞争。除了规模经济产生的进入壁垒外，新进入者需要长期的经营，通过不断的干中学掌握技术，建立销售网络，完善生产系统，才能获得与现有主要竞争对手一样有效的生产技能和经验。经济学上将这种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称为“保留产业”，即启动成本高，难以以小规模进入，从而为现有生产者提供了很高程度的保护，使之免于竞争性进入的威胁，容易保留既有地位。与古典贸易模型中由自然优势确立的唯一均衡结果不同，保留产业的形成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比如一场战争或一位高瞻远瞩企业家的大胆尝试都有可能开辟一个新产业并获得规模优势。保留产业的出现导致以自然优势为基础的世界贸易均衡结果不再唯一，在一个普遍存在高启动成本的规模经济中，有可能产生大量的均衡结果。这些结果不是无序的，它们会形成一个有序分布，以此来判定贸易对各个国家经济福利的影响。保留产业的出现使经济上具有互补性的两个国家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贸易上体现的是产业间的竞争关系，它使得一国不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环境下的某些均衡，因为这些均衡会导致其贸易对手受益的同时使其自身利益受损，福利水平甚至会低于封闭经济的福利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会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贸易利得。

三、多重均衡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产生

最早将规模经济与多重均衡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是马歇尔。^① 弗兰克·格雷厄姆 (Frank Graham) 证明了由保留产业所产生的多重均衡可能使某些国家的福利水平比封闭经济下的福利还要低。^② 20 世纪 30 年代，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首次讨论了多重均衡，认为当均衡偏离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点时，政府应该采取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对自由贸易进行干预，以摆脱不理想的多重均衡状态，提高福利水平。此外，对多重均衡研究做出贡献的还有米德 (Meade)、克鲁格曼 (Krugman)、罗默 (Romer)，他们已把研究的假定从传统贸易理论的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等转化为规模经济和

① Alfred Marshall, *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Cambridge, Privately printed, 1879.

② Frank Graham, *Exchange,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 Inflation*, 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1923.

不完全竞争，所讨论的模型不再是传统的 $2 \times 2 \times 2$ 贸易模型。^{①②③④} 需要指出的是，引发国家利益冲突的并不是产业具有保留性，而是由于多重均衡的出现，无论是保留产业导致的多重均衡还是通过学习技能提高生产率水平导致的多重均衡，都会产生国家利益冲突。^⑤

(一) 专业化情形下的多重均衡与利益冲突

与古典模型不同，在一个以保留产业为特征的经济中，会产生大量的均衡结果，有一些结果可能给一国带来很高的经济利益，并提供大量的贸易所得，而许多其他的结果可能真的非常糟糕。^⑥ 假设世界上所有产业都具有保留性，一种产品只由一个国家生产，当然这种完全专业化的情形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常见，因为同时占据一个保留产业较大市场份额的国家往往并不止一个。但是，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主要研究一种产品只由一个国家生产的专业化均衡，由此得出的结论将适用于多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形，而且也适用于不是所有产业都具有保留性的情况。

为了体现全球贸易，假设世界上只有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与规模收益递减世界中只有一种稳定均衡结果的情形不同，保留产业的两国世界将产生许多均衡结果。如果两国只交换 10 种产品，由完全专业化均衡数量的基本方程 $2^n - 2$ 可知，将有 1 022 种可能的均衡结果，如果交换的商品达到 20 种，就会有超过 100 万种可能的均衡。由于现实中有成千上万种产品参与交易，因此，潜在均衡的数量是巨大的。

表 1 贸易品的数量和均衡的数量

贸易品的数量	2	3	4	5	6	7	8	9	10	n
均衡的数量	2	6	14	30	62	126	254	510	1 022	$2^n - 2$

回到只有 10 个产业的两国假设，对每一个均衡——国家和产业的每一种可能组

① J. E. Meade, "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62 (1952), pp. 54 - 67.

② Paul R.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85.

③ Paul M. Romer,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Cambridg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4.

④ Gomory, R. and W.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⑤ Hoa, T. V., *Competition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Major Asian Economies*, London: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0.

⑥ 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23 页。

合，我们都将用标准的经济方法来计算由此导致的国民收入。两国的国民收入可以用每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数量乘以每种产品的价格来计算（为方便起见，我们用美元来表示）。对于每种均衡的结果，一旦我们已经确定每个国家从事何种产业的生产，标准化的经济方法就会告诉我们每种产品的供给量和销售价格，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首先把每种商品的价格乘以其供给量来获得该产业的总收入，然后，把所有产业的总收入加总就得到该国的国民收入。一旦确定了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就能很容易地计算出每个国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假设在一个均衡点上（图 1 中的 A 点），英国的国民收入是 8 万亿美元，法国的国民收入是 12 万亿美元，则世界总收入为 20 万亿美元。那么，英国和法国的世界收入份额分别为 40% 和 60%。如图 1 所示，将一国占世界收入的份额用横轴表示，则英国的份额是从横轴左端的 0 点向右端的 100% 点移动，法国则从相反方向移动，同时，用纵轴表示特定国家的国民收入或世界收入。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描绘出 10 个产业分配在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所有均衡点，结果如图 2 所示，带状区域包含大约 1 000 个点。这些点代表了模型中所有的专业化均衡。在这些均衡点上，一个国家是某一特定产业的唯一生产者。当然，如果加入所有可能的非专业化结果，即一个产业由多个国家同时生产，那么将会出现更多的均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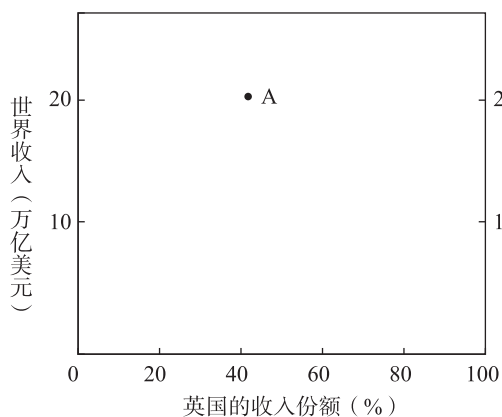


图 1 均衡的一种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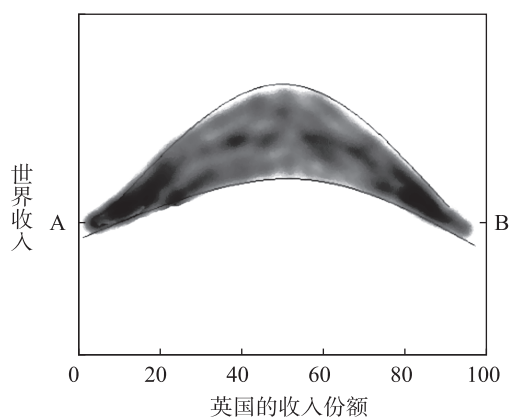


图 2 多重均衡

在图 2 中，1 000 多个均衡点落在了一个明显的带状区域内，上边界线表示最高水平的世界可能收入，在由英法两国 10 个产业组成的世界中，带状区域的每种世界收入

水平都有可能发生，中间凸起的部分表示最高水平的世界收入，而在低处的两端则是英国或法国将生产世界上的所有产品，也就是说，一国占据世界收入百分之百的份额，而另一国几乎什么都不生产，这样的均衡结果似乎是无效率的，因为一个国家要为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它不得不在许多产业之间分配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产量和世界收入都会比较低。相反，在带状区域的中间部分，每个国家都专业化生产其最适合生产的产品，此时，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可以更好地实现贸易所得，获得更高的世界收入。

为了说明国际贸易可能引发的国家利益冲突，在两国模型中，需要对英国和法国的均衡点分布图进行讨论。根据经济学定义，英国或法国的国民收入等于世界收入乘以英国或法国在世界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可以将图 2 中的每个均衡点转化为图 3 或图 4 中的均衡点。转化的结果为：纵轴代表英国或法国的国民收入，横轴代表英国或法国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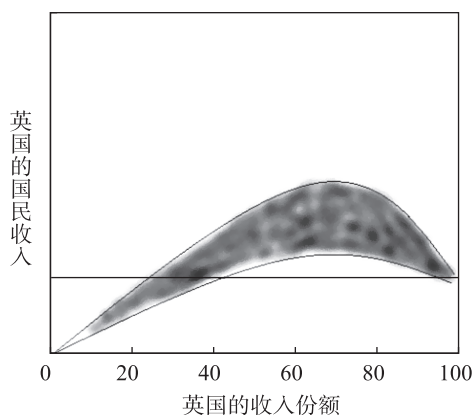


图 3 英国均衡点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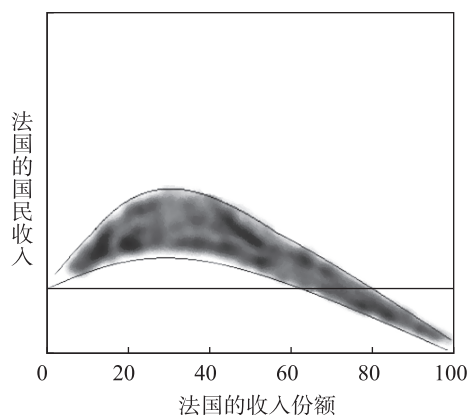


图 4 法国均衡点分布

我们以英国的国民收入图（图 3）为例来分析单个国家均衡点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在图 3 中靠近左端的位置，英国占世界收入的份额非常小，所以国民收入很低；而在右端，英国的份额接近 100%，故其国民收入约等于世界收入。在呈山形的英国均衡点分布区域内，最初，带状区的上边界线随着世界上边界线的上升而上升，除此之外，英国的份额也在逐步增加。当英国的份额超过世界收入的顶点时，英国的上边界线仍将继续上升，但随着世界总产出的下降，其上升速度变慢。最终，英国边界线在世界边界线最高点右边的某个点达到最高，然后开始下降。如图 3 所示，存在这样一个均衡区域，它的收入水平甚至要低于无贸易时的收入水平，也就是位于实线下方的点，

所有这些均衡结果都将使一国随时采取行动以退出贸易，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不利的结果是靠近图 3 左侧的均衡，在这些均衡上，英国从事的生产很少，其情况类似于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英国的均衡点分布图有着以下几层经济含义。首先，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并非总是自动地使各国受益，存在一些均衡使一国的境况坏于其完全撤出贸易时的境况。其次，均衡分布图展示了一国国民财富与其世界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在英国达到山形图的最高点之前，国民收入随着它占世界收入份额的增加而增加，一旦超过最高点并继续向右端移动，国民收入便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在达到某一点之前，通过进入更多的产业获得的收入份额上升有利于一国财富的增加，当超过这一点时，从事更多的产业将损害该国的利益，使该国的国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通过对均衡点的分析可知，每个均衡结果都代表着一国产业的数量和规模，这会影响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福利状况。一国可以只有很少的产业，那么它的国民收入将会非常低；相反也可以有很多的产业，而此时过多的产业会使它的财富状况不如产业较少时的情况。

法国均衡点分布图（图 4）与英国几乎具有一样的经济特征，在此不做过多讨论。下面，更进一步地，我们将二者（图 3、图 4）进行合并以验证国际贸易中存在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合并后的图形（图 5）形成了两山相连的结构，法国带状区的山顶总是位于英国带状区山顶的左侧，两条垂线 L_1 和 L_2 穿过两个最高点，由此将均衡点的带状区划分成三个区域。在左边的区域，两国的上边界线均向右上方倾斜；在右边的区域，两国的上边界线均向右下方倾斜；在中间区域，英国的上边界线向右上方倾斜，而法国则向右下方倾斜，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合并图的经济含义。

如图 5 所示，在均衡点划分的三个带状区域中，左右两个区域都布满了可以进一步得到改进的均衡结果。通过向更靠近中心的均衡点移动，两国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国民收入。如若英国占世界收入份额的 85%，它就可以获得一个 U_2 点高度的国民收入，但是，当英国的世界收入份额降至 80%，其国民收入就会上升到 U_1 点，同时，法国的国民收入也会从 F_2 上升到 F_1 。也就是说，在左、右两端的带状区域内，法国和英国分别通过让渡一些产业从而提高其贸易伙伴对世界总产出的贡献，可以使两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均得到提高，在新的均衡点上，两国的产业分布和收入份额将更加均衡，世界总收入也会增加。这个结果与我们讨论单个国家均衡点分布的情形是一样的，那些位于可能结果带状区的最右端和最左端的均衡对于每个国家都不利，在这些点上，一个国家占据了太高比例的产业，从而在一个相对较小的世界“蛋糕”中拥有较大的份额，而另一个国家几乎不从事任何产业的生产，此时，摆脱这种状态将使两国都受益。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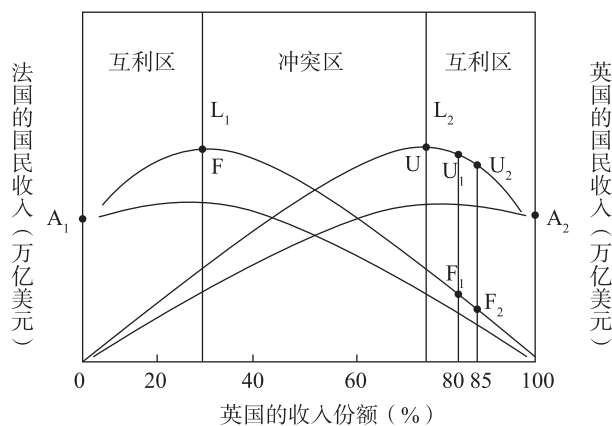


图 5 英法两国国民收入的比较

资料来源：Ralph E. Gomory and William J.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0。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产业的主要领导者，同时，它的贸易伙伴也因此减少，为了帮助其贸易伙伴走向复苏，美国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向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各国提供了大量援助，这显然是美国道貌岸然的自利行动。^① 尽管这一计划导致美国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但它刺激了欧洲的经济，使其能够更好地与美国开展贸易，购买美国的产品，从而增加了美国的绝对财富以弥补其世界收入份额的下降。

在合并图的中间区域，英国的上边界线向右上方倾斜，法国的上边界线向右下方倾斜，两国的利益相互冲突，此消彼长。提高法国的收入份额会使法国的国民收入增加，英国的国民收入下降，反之亦然，即一国境况的改善必定使另一国的境况恶化。两国在贸易领域展开的竞争将会导致一国吞并另一国的一个或几个产业。

专业化情形下的多重均衡表明，两个贸易伙伴之间既有共同获利的可能性，也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若两国位于左右两端的互利区，它们可以通过合作促进产业间贸易进行合理分配以增进国家福利，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大多如此；若两国位于中间的冲突区，则面临产业间的直接竞争，一个国家若想通过提高世界收入份额增进自身利益必然牺牲他国利益。

^① 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二）不同生产率情形下的多重均衡和利益冲突

如果我们不再假定所要分析的产业是保留产业，而是回到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与其不同的是，生产率是动态变化的，一国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实现技术赶超，提高生产率，成为一个产业的竞争者。此时，我们会发现，与保留产业一样，生产率变化所导致的多重均衡也会引发国家利益冲突。

假定生产是线性的，即不存在进入成本与规模经济，每个产业只由最具生产效率的国家来生产，它将导致一个唯一的、预先决定的国际贸易结果。但是，如果生产率是动态变化的，则生产率的不同组合就会产生不同的均衡结果，对一国来说，有一些结果可能给它带来很高的经济利益，并提供大量的贸易所得，而许多其他的结果却非常糟糕。由生产率变化引发的多重均衡与保留产业模型的数学分析是一样的，两个模型的两国合并图具有相同的区域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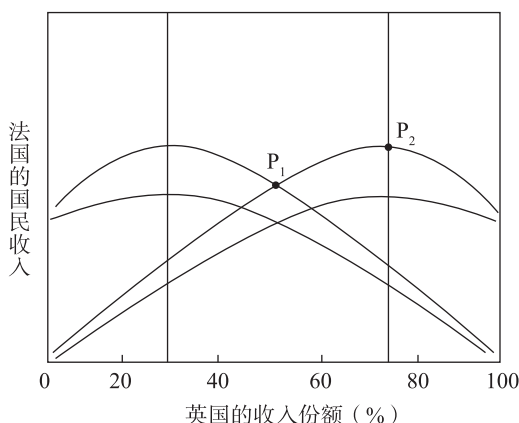


图6 有两个重要均衡的两国合并图

资料来源：Ralph E. Gomory and William J.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0。

如图6，在两个最高点之间的区域，两国的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一国收入份额的增加使其自身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却使其贸易伙伴的国民收入下降，而在两端的互利区内，两国可以实现合作共赢。与保留产业多重均衡模型不同的是，此时的模型不存在可保留性，生产者可以小规模地进入一个产业，并通过技术赶超提高生产率，那么，发达的高工资国家怎样才能保持产业竞争优势呢？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只有当其贸易伙伴是一个欠发达国家时，发达国家即便工资水平很高，也能在产业竞争中保持领先

地位。假定英国是发达国家，法国是欠发达国家，如图 6 中的 P_2 点，英国占有很大的世界份额，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产业，其国民收入很高，工资高；与英国相反，法国只能控制少数几个对它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国民收入很低，工资低。对英国来讲，尽管其工资高，但是生产率的优势足以使它成为成本更低的生产商。但是，如果法国通过不断的干中学提高了生产率，并开始从 P_2 点向左端比较发达的状态移动，那么，对于英国而言，它将不再是理想的贸易伙伴。也就是说，如果欠发达的贸易伙伴进入一个新产业并且获得了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发达的贸易伙伴一开始会因此受益，这一受益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此后，欠发达国家更多产业的进入将对发达国家不利。这也印证了经济学家的观点，某些情况下，外国某个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有可能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利益。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可保留产业的模型中，还是由于技术赶超而导致的生产率发生变化的模型中，国际贸易都存在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这个结论将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多重博弈特征以及制定博弈应对策略。

四、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转变

2018 年 7 月 6 日 00:01（北京时间 6 日 12:01），美国背弃了中美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开始对 6 月 15 日公布的第一批清单上 818 个类别、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 7 月 6 日同一时间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① 中美贸易战是美国以缩减贸易逆差、增加就业、促进制造业回归为由向中国挑起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贸易战。但是，从中美贸易逆差的生成机理（产业转移和全球价值链布局）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来看，贸易战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战略竞争关系转变所引发的国家利益冲突，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所采取的战略性的贸易政策。

从 2015 年开始，美国学者就围绕中美战略关系是否全面失败这一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各界达成了共识，即中美关系已进入关键转折期。“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对中国的战略接触全面失败”成为建制派、反建制派，民

^① 谢地、张珏：《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年第 5 期。

主党、共和党以及政界、产业界的一致呼声，美国各界一致认为“中国崛起”正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特朗普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33 次提到中国，称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在《2018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更是对中国多加指责，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是想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虽然以往美国也曾不同程度地表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忧，多次将中国称为美国的竞争者，但考虑到中美利益仍存在互利共赢的一面，因此“接触+遏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总基调，并且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国家。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乎绝口不提中美共同利益，而直呼中国为“竞争对手”，标志着两国战略竞争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经济利益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取代

一方面，如前所述，国际贸易存在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当一个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提高到其在这个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候，更多产业的进入将损害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中国改革创新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三个重大转变：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变，全球价值链及出口结构布局由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变。这三重转变势必会与在全球贸易布局中掌控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领域的美国发生竞争和碰撞，破坏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利益格局，挤占美国在全球市场上的获利空间，表现在均衡分布图中即两国正逐渐从互利区步入冲突区，贸易中的互利共赢关系开始转变为竞争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竞争优势迅速弱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大规模转移，中国逐步摆脱为发达国家提供价值链低端产品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自主品牌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创新型企业兴起，这势必会挤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华投资的市场占有空间，威胁其技术垄断地位，进而弱化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缩小其盈利空间。这些因素的综合叠加效应，导致中美两国经济利益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取代。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为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刺激美国对华产品的出口，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表现形式正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两国战略竞争重点发生改变，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二）经济竞争成为两国战略竞争中最根本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虽然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既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也有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所有竞争的背后都以经济竞争作为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也在世界范围内被传播和复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意义，而这些正是建立在其经济领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国丧失了经济的绝对领导地位，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未必具有“普世价值”，这是美国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者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在他们看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其经济规模将与美国不断接近，这势必会削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进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之前，美国必须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破坏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有利环境，控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维持和延续美国经济的绝对领先地位，贸易战就是美国实现其战略意图的手段之一。

（三）高科技领域已经成为中美经济竞争中的关键环节

从美国根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1300种产品、约500亿美元的总贸易额征税清单中可以看出，其主要覆盖了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高铁设备、新能源汽车及航空设备等领域，基本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范围。^① 如果只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那么美国应该对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等中美贸易顺差行业加征关税，而不是中国并不占贸易顺差优势的高科技领域。^② 在美国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处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美国只需要严格执行出口管制就能保持其领先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美国不得不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其既有优势。可见，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首要意图并不是减少贸易逆差，而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崛起，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今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既定事实，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所引发的龃龉和对撞将不可避免。

① 谢地、张珏：《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5期。

② 谢地、张珏：《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5期。

五、中美贸易战多重博弈策略的走向及预判

从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内在动机可以看出，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全球产业布局中与美国将有越来越多的重合点和竞争点，国际贸易中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会使美国频繁运用战略性贸易策略，遏制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终极目的之一是要迫使中国彻底开放市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谋取最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斗而不破、边谈边斗”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主旋律，博弈策略的走向及预判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对中美贸易战升级和扩大范围可能性的预判。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战经历了几个回合的升级与交锋，双方进行了11轮磋商，谈判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就大部分内容达成共识，但也几经波折，其中美国三次出尔反尔，违背共识，不讲诚信。2019年5月6日，美国不负责任地指责中国立场“倒退”，企图将谈判迄未完成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并不顾中国坚决反对，自5月10日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至25%，^① 违背了双方2018年年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国元首会晤中达成的暂停升级关税的共识，导致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5月13日，美国宣布启动对剩余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出于对美国贸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回应，我国已决定自2019年6月1日0时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继续加征5%关税。^② 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也不能幸免，中美贸易战历时一年，其消极影响开始在美国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圣诞节前夕华尔街三大股指的连续暴跌使美国人期待已久的圣诞行情变成了百年来最糟糕的圣诞表现，贸易赤字的不降反升，大豆市场的惨淡经营都让人不得不将后果归咎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然，中国在贸易战的反击中也会付出巨大代价，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坚持做到：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美国态度的转圜，是贸易战所显现出来的不利影响促成的，但是，对于这一积极变化，我们还是要以平常心对待，因为以前中美也曾发表联合声明，承诺不打贸易战，但最后贸易战越

^①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6月。

^② 包兴安：《中国6月1日起对美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证券日报》2019年5月14日。

演越烈。我们要时刻谨记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冲突源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中国实现赶超的必然选择，绝不可能因任何国家的阻止、干预、打压而发生改变。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美国没有达到有效遏制中国崛起的目标，没有使中国做出不对称让步，中美贸易战就会一直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且有可能延伸到投资、外汇、金融等领域。当然，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和扩大范围也会受到双方经济的承受力、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利益相关方的分化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第二，如前所述，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虽然根本上是经济竞争的体现，但同时也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因此，中美贸易战战略博弈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视角，而应从经济、政治、制度、价值观等多重因素进行考虑。美国作为贸易战的发起方以及博弈主动权的掌控方，必然会利用自身在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优势来谋划战略布局，同时找准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切弱点迫使中国做出让步，具体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新构建符合美国绝对利益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体系和经济治理体系，破坏原来以多边贸易为主的 WTO 自由贸易体系规则，转而奉行国内法优先原则。二是采用“规锁”手段来约束中国。“规”是制定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作为，“锁”是把中国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使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距离处在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内。三是加大减税力度，吸引制造业投资回流美国，维持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四是如果不能迫使中国做出不对称让步，那么在贸易领域之外，美国会打出金融、汇率、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组合拳来打压中国。如制造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和谐环境，利用朝鲜半岛问题迫使中国就范，阻挠“一带一路”建设等。

第三，为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很有可能拉拢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共同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博弈策略。从特朗普挑起的钢、铝关税的制裁结果来看，其争取盟友抱团打击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对于这个问题，要有一个一分为二的判断，一方面，如我们前面在贸易模型中所分析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随着生产率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在产品价值链上必然会从中低端向高端环节转移，这一过程势必会在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挤占发达国家的市场，同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和碰撞，也意味着我们同其经济发展上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会打破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和贸易体系，最终会破坏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战略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很多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将失去大量的贸易所得，如德国、日本、印度。相反，对于中国来讲，随着经济已经从出口、投资驱动为主转向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阶段，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之健全的工业体系使其并不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未必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即便美国凭借强大力量争取到了战略联盟，该联盟也会因固有的利益冲突而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四，对 WTO 是否存在被破坏甚至瓦解可能性的预判。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是自由贸易体系造成的，自由贸易体系使美国利益受损的同时却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会试图削弱 WTO 自由贸易规则，转而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利益和发展竞争冲突加剧，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全球价值链体系谋求更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发达国家需要重振国内制造业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国家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单边主义必然无法达到稳定的博弈均衡状态，只有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统筹兼顾起来才有可能形成全球经济状态下稳定的博弈均衡状态。就现有的 WTO 体系来看，到底是优先满足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的利益，还是优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或是两者并重，已经成为各国贸易摩擦的焦点。单边贸易和双边贸易体系自身存在国家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使得美国试图破坏 WTO 多边贸易规则的计划难以为继，从追求美国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必然无法打造一个能够有效代替 WTO 的新型贸易体系。因此，更为客观的结果应是在各方的博弈下，共同推动 WTO 规则的升级，而不是将其破坏或瓦解。

六、中国应对策略的综合思考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中美两个大国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与美国这样一个最大发达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龃龉、对撞。任何国家都有权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各国的平等权利，在国际贸易中同样如此，美国和中国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也不例外。在平等权利抗衡的过程中，傲慢、

霸道、苦情、示弱都无济于事，只有依靠理性和力量才能最终占据上风。^① 面对美国可能实施的多重博弈策略，唯有立足我国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复杂情势，坚持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在矛盾、挑战中捍卫国家利益。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美贸易战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只要中国不停止崛起的步伐，中美贸易战就有可能一直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也是中国在博弈中维护国家权益、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根本保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恐惧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制度、价值观等方面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而消除这种恐惧的关键也是中国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国家强大到无法被遏制的地步。^② 因此，面对美国的多重战略手段，我们唯有保持理性的战略定力并继续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避免经济陷入“后发劣势”的泥潭。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靠的正是“后发优势”，然而，中美贸易战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继续吃“后发优势”这张大饼已难以为继。以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的三大优势正逐渐消失，伴随而来的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加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使得如果继续依赖“抄作业”的发展模式将会使经济陷入“后发劣势”的泥潭，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它是推动技术进步、企业创新的源泉。二是提高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2018年7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到，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关键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③ 从中美贸易战我国被迫接招的现实中，我们应当看到这一不足，而非沉浸在沾沾自喜中。在我国，很多高科技合资企业的技术活动都严重依赖其母国，产品的研发都集中在公司总部，中国基本没有参与的空间。对此，

① 谢地、张珏：《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5期。

②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3期。

③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著：《中美贸易摩擦：怎么看怎么办》，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

习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如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会永远被他国牵着鼻子走，成为他国威逼利诱的工具”。^① 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经历了几百年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既然我们已经利用“后发优势”走过了他们几百年的发展道路，也就不怕再用几十年，完成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原始积累，做到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潜心治学、踏实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② 三是转变优秀人才的培养机制。做好科学基础研究的关键是优秀的人才。放眼世界，凡是在技术上领先的国家都有强大的教育作为支撑，集中表现在诺奖得主数量、世界排名靠前的名牌大学、公平的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并不差，但是在2015年国际评估项目测评中，很多中国学生解题解得很好，但是想把科学作为终身事业的人却寥寥无几。

（二）实施对等的贸易制裁策略

针对美国挑起贸易战背后的战略意图，我们必须做到：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要么回到谈判桌前，展开经贸磋商；要么针尖对麦芒，实施对等的贸易制裁策略。如果中国在贸易战中显示出示弱或妥协的苗头，就会正中美国下怀，从而强化其强硬立场，利用中国的弱点进一步打压中国以索取更多的利益，同时还会诱发美国拉拢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共同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博弈策略，采取“群殴”方式来围堵中国，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要做的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凝聚共识，统一信心，绝不能陷入谁更依赖谁、谁的产品更容易被替代的短期博弈认知中。

（三）坚持分离均衡的博弈策略

如上所述，既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多层次、多维度的，那么中美贸易战的战略博弈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视角，而应从经济、政治、制度、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在贸易领域之外，美国很可能会打出金融、汇率、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组合拳来打压中国。面对这些组合拳，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分离均衡的博弈策略，对不同的问题与矛盾加以区分，如哪些是两国经济利益的竞争问题，哪些是国家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著：《中美贸易摩擦：怎么看怎么办》，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

②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著：《中美贸易摩擦：怎么看怎么办》，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58页。

战略问题,哪些是发展模式的差异问题,哪些是价值观差异的问题,等等。^①对于事关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问题,坚决不能退让;对于经济利益竞争问题,有商量的余地的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不要将其范围和严重程度扩大化。做到能谈则谈,不能谈的绝不妥协,不接受任何混合形式的博弈策略利益交换,见招拆招,不盲目应对,以免落入美国布下的多重博弈陷阱之中。

(四) 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需要用全方位开放来抵抗美国贸易战带来的消极影响。全方位对外开放主要包括三大市场。一是开放物质产品市场。通过降低市场准入条件,降低进口关税,特别在海南岛实行零关税政策,在上海成立永久性的进口贸易博览会等措施来扩大进口。因为物质产品市场一旦开放,不仅会刺激国内消费,同时还会提高供给水平,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二是开放服务市场,包括金融、教育、医疗等,比如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持股比例已经放宽到51%,批准成立新的移民局以鼓励外国医生、教师到中国工作。三是开放投资市场。2018年6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所列项目由原来的63项降到了48项,为外商来华投资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环境。

(五) 加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外贸整体增速3.7个百分点。^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中国外贸发展空间,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做好三方面服务:一是金融服务,以推动中国产品更好地走出去;二是基础设施服务,“一带一路”供应链的背后需要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只有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才能形成连贯的产品供应链;三是法律服务,成立“一带一路”法院,为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

^①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3期。

^② 阮宗泽:《“一带一路”:塑造共享的21世纪》,《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六）充分运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弱化多边贸易规则，奉行国内法优先的背景下，针对特朗普政府依据国内法对中国进行的各种贸易调查，同时防止贸易战愈演愈烈，我国需要在 WTO 框架下积极应对，运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并不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①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 Interests: Multiple Games of Sino-US Trade War and China's Way Out

Xie Di Zhang Gong

Abstract: Both the traditional trade model and the new trade model believe that trade can make win-win results, and the welfare levels of countries will be improved through trade. Of course,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strict assumptions such as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If we revise the assumption of the original model, that is, considering the reserved nature of industry where the latter can achieve catch-up strategy by learning skills, we will find that there are inherent conflicts of national interests among trading countries. The most favorable outcome for one country tends to be harmful to another. This means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zero-sum resul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Conflicts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ake countries frequently use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to cope with trade-induced competition. At present, from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s trade war with China, we can see that with the rise of China, more industries in China will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trade. The interdependen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competitive relations. It is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urb China's rise and

① 谢地、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5期。

catch-up and to seek greater benefi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development. If the United States fail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Sino-US trade war will probably be in a continuous and escalating repeated game. Therefore,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e should maintain a strong and rational strategic focus and formulate game response strategi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gam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conflicts of national interests; multiple game

Authors: Xie Di, Dean,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Zhang Gong, Ph. D.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Lecturer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